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

总主编 步平 沈强 邵铭煌(台湾)

抗日战争时期 后方工业建设研究

◎ 李学通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

总主编 步平 沈强 邵铭煌 (台湾)

抗日战争时期 后方工业建设研究

◎ 李学通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工业建设研究 / 李学通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5. 5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 / 步平, 沈强, 邵铭煌主编)

ISBN 978-7-5126-3508-1

I. ①抗… II. ①李… III. ①工业史—中国—1937~1945 IV. ①F429.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3600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90 (01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70mm×24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82千字

印数: 2000

版次: 2015年6月 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5126-3508-1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编委会

总主编 步平（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
 沈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
 邵铭煌（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

执行主编 荣维木 罗存康 唐立馨

编委会成员 步平 沈强 邵铭煌（台湾） 荣维木 罗存康
 李蓉 梁光玉 赵广宁 唐立馨 李鑫 赵晓丽

总序

步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将《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奉献给广大的读者。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开始，回顾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便成为有觉悟的中国人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停止的不断思考的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不断超越。从考证各个战斗、战役的成败得失，到分析评价战略决策的提出与制定；从对战争场面和战争罪行的具体的实证研究，到对抗战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关系的历史哲学思考的升华，每个时期对抗战历史的总结与思考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印记。在战争结束70年后的今天，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发生战后以来巨大变化的今天，以“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命题确定丛书的题目，反映了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对抗日战争的思考。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的腐朽与经济的衰退，无法遏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中国在列强的一次次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都是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而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直至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并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迫使中国撤除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即解除防务，而外国军队则驻扎于中国京畿周围的要地，实行永久军事占领。中国被西方殖民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所束缚，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约束中，中国一步一步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中国人民当然不甘心忍受列强的欺凌和侵略，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反帝

爱国活动。特别是1901年以后，中国国内陆续掀起了拒俄运动、反美运动、收回利权运动、拒英运动、拒法运动，以及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运动。1919年5—6月间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四运动”。虽然这些运动标志着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和主义的出现，使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沉沦”转而“上升”的趋势。但是，一次次的斗争，都不幸以失败告终，中华民族复兴的梦始终未能实现。

近代中国追求复兴，面临十分艰巨的困难。摆脱帝国主义的外来干涉侵略与压迫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步。中国近代历史上，不乏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终生甚至牺牲宝贵生命的英雄壮举。民族复兴的追求是几代人的目标和理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前人为中华民族复兴进行的努力。当年，孙中山先生痛感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人们以这样一种精神支撑着从坎坷的历史中走过来，但坎坷的历史也告诉了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那就是：处于分裂、战乱状态，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中国只能遭受战争的苦难；一盘散沙的社会，不可能在与侵略者的殊死战斗中取得成功；只有我们的自觉和觉醒，才能让侵略者面对的不再是软弱犹豫的对手，而是强大的不可侮辱和不可征服的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胜利。由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与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中重要的一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成效：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的锁链被废除；中国收回了被割让和被侵占的土地，台湾也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作为大国登上国际活动的舞台，摆脱了弱国的阴影。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复兴中国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所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是中国复兴的枢纽。

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集中显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蓬勃伟

力。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毅然奋起，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正是基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抗日战争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深刻揭示了民族自强是国家自立的根本保证。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教训和抗战胜利后建设发展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说明，民族团结，国力强大是国家免受外来侵略和压迫，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发展则是实现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根本动力和成功的原因。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5，从任何角度看，中国人民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息息相关。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发展使 13 亿人口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谐地生活，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更对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全人类利益负有责任。所以中国的复兴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其影响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也在正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为世界所瞩目。因此，在中国走上复兴之路后，更要不断探索，思考如何对人类社会以更大的贡献。

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当然需要提出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口号以动员民众，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爱国主义的传统则成为我们民族向下一个目标前进的重要思想与精神资源。在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来越深，各个领域都面临国际化的情况下，如何将我们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如何正视中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如何使中国对国际社会以更大的贡献，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新课题。中国需要用坚持走和平与发展道路的实际行动消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在这方面，还有更长的道路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的丛书由 20 册构成，力图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在挖掘有价值的史料的基础上，在系统整理近 10 年来海峡两岸学术界抗日战争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答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重大的课题。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努力，促进和推动两岸学术界对抗战史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希望能够激励海内外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促进海峡两岸同胞乃至全球华人的交流和团结，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做出积极的贡献。

（总序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

目 录

CONTENTS

- 1 第一章 战时工业体系的创立
- 2 第一节 战前中国工业状况
- 5 第二节 经济备战中的工业建设
- 16 第三节 工业内迁运动
- 26 第四节 新机构、新方向

- 29 第二章 机构调适与政策演变
- 30 第一节 机构调整与权力分配
- 37 第二节 战时工业政策的演变

- 51 第三章 工矿电各业的发展（一）
- 52 第一节 矿冶工业
- 88 第二节 机械电器工业
- 97 第三节 电力工业

- 104 第四章 工矿电各业的发展（二）
- 105 第一节 化学工业
- 113 第二节 液体燃料工业

132	第三节	轻工业
141	第四节	兵工企业
151	第五章	困顿与挽救
152	第一节	战时经济危机的表现与原因
171	第二节	挽救危机的措施与效果
192	第三节	经济援华与战时生产局
218	第六章	战时工业的贡献与局限
219	第一节	工业科技的进步与贡献
240	第二节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255	第三节	战时工业建设的效益与局限
276		后 记

1.

第一章 战时工业体系的创立

经济既是引发战争的根源，也是维持战争的基础和推动战争的动力。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经济，是这一时期中国军事、政治、外交、文化等活动的基础，也是中国持久抗战的支撑点。

抗日战争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极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侵华战争的破坏摧残和日寇疯狂的经济掠夺，使中国经济遭到空前的创伤，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损失惨重，阻断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战火硝烟之中的抗战大后方与敌后根据地经济，不仅没有被打垮，而且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步，有效地支撑了中国八年抗战，成为中国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重要保障；同时，因为经济重心的转移，对于矫正中国近代经济布局的畸形状态客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战时的需要也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矿企业的发展，以及生产技术的改进、专业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的培养与训练。但是，这种发展和变化更多是被迫的无奈之举，而非中国近代经济自然的符合逻辑的发展。

抗战时期，中国近代工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对这种变化及其影响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之后人们才能逐渐认识清楚的。变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或许只是当时为了因应战争的需要，但它在产生之后所展现出的作用，则让许多人生发出新的观念和意识。这些观念和意识又反过来作用于现实，使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走向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

不过，我们还是先来考察一下，中国战时经济体系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对于八年抗战到底产生了什么作用。

第一节 战前中国工业状况

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逐渐创办发展起近代工业，其发展历程虽屡经曲折，但量的积累还是不断加增。辛亥革命以后，从南京临时政府到北洋政府，都颁布或修订过许多推动近代工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称为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工业也有了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基本上采取了自

由资本主义的模式，即以民营企业为主体，除交通、邮电业外，政府几乎极少直接参与企业创办和经营活动，军阀、官僚的企业经营活动大多也都是以私人名义进行的。

中国国民党在推翻北洋政权、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经济上标榜以实现孙中山民生主义遗教为职志，以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为其经济纲领。然而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之时，中国总体而言仍然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近代工业的数量与规模、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极低，轻重工业比例很不合理，区域分布更是呈现集中于沿海沿江的畸形状态。在一场全面的民族战争来临之时，中国近代工业种种落后的窘况被暴露得一览无余。

战前中国工业的规模与特点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以现代化工业为基础的，然而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在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这场抗日战争中，尚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中国，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与工业化了对手——的日本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工业化程度非常低，总体而言仍然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近代工业的数量与规模、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极低，轻重工业比例很不合理，区域分布更是呈现集中于沿海沿江的畸形状态。据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受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于 1933 年对中国工业的普查统计，全国工厂仅 2435 家（包括未调查地区在内不超过 3000 家），资本额 406872634 元，工人 493257 人，产品总值 1113974413.02 元。^①特别是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中国民营工业发展处于停滞和衰退的状态。1932 年国民生产总值为 288 亿元，1933 年为 242 亿元，1934 年为 213 亿元，1935 年开始略有回升，为 237 亿元。^②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恰逢空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欧美日各国

^① 中国工业调查报告，资源委员会印 1936 年。

^② [美] 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244 页。

竞相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转嫁危机，中国国际经济环境出现重大变化。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步步升级，南京政府也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应对，如发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设立资源委员会，发展国营工矿业等，以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政府对经济命脉的控制能力，并提出确定国民经济之中心于内地，和以国防为中心的腹地经济建设计划。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民生主义政策为指针，倾慕统制经济政策，强调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机构更加向统制经济强化。

随着南京政府币制改革的成功，金融稳定，物价普遍回升，1935年以后民营工业出现转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936年登记的工厂数为2441家，其中该年新增工厂有193家，包括纺织业40家，饮食业75家，机器业、皮革业、服装业11家，火柴业6家，电工器材业4家。工业生产也有明显增加。与1935年相比，1936年棉纱生产增长65.63%，棉布增长17.7%，火柴生产增长300%，卷烟生产增长70.23%。^①工业产值也从1931年108亿元，1932年96亿元，1933年88亿元，1934年82亿元，1935年89亿元，恢复到1936年的102亿元。^②

即使如此，据统计，1936年12月全国登记的工厂也只有3131家。^③特别是中国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产量甚微。1933年主要重工业产品产量为：钢2.5万吨，铁60.6万吨，铜500吨，铁矿石231.3万吨，煤2837.8万吨，石油9.1万吨，酸类5000吨，机器制造业产值1934.1万元。^④我国每年所需的机器，平均有76%依靠进口，车辆船舶83%依靠进口，钢铁95%依靠进口。化学、光学仪器、石油等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工业不仅不发达，有些甚至是空白，如制造火炮的特种钢材和制造枪炮壳的铜材以及光学仪器、通讯设备的生产几乎为零。同一时期，日本有工厂106005家，工人293.7万人；钢产量为309.7万吨；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63页。

② [美]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译本，第244页。

③ 《民国二十五年全国实业概况》，实业部统计处1937年3月编印，第50页。

④ 张大巖：《新中国重工业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工业》第3卷第5期，转引自祝兹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634页。

生铁产量为 203.1 万吨；煤产量为 3000 万吨。

第二节 经济备战中的工业建设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步步升级。1932 年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把战火引到中国经济的核心上海。随后，日军又向热河及长城沿线进攻，占领了山海关、热河，甚至深入冀东，包围平津。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指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将“剿共”视为首要，对日采取“不扩大”态度，但同时也对可能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其中经济方面的备战以军委会所属资源委员会主持的工矿业建设为核心，另外还包括币制改革、公路整理与铁路建设等。虽然因为时间匆促等原因，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未及充分展开，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对于战争初期迟滞日本侵华步伐，特别是对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形成支撑抗战的经济基础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国防工业的筹建

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南京政府于 1932 年春成立军事委员会。同年冬，蒋介石以“国难当前，国防机务，万端待理，为集中人才，缜密设计起见”，又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蒋介石任参谋总长）秘密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期确定计画，从事建设”。^①该会由蒋本人亲兼委员长，邀请著名地质学家、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出任秘书长，蒋介石的秘书钱昌照则以副秘书长名义在南京主持具体工作。

国防设计委员会以“一，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计画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三，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为工作范围，^②除行政院各

^①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册，台湾“国史馆”编印，1984 年，第 16 页。

^② 《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第 18 页。

部会负责人均为当然委员外，另聘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学者专家 40 余人为委员，按军事、国际关系、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运输及交通、文化、土地及粮食等专题，分别从事相关国防调查与设计工作。受聘担任该会委员的各方面专家学者有丁文江、曾昭抡、陶孟和、刘大钧、蒋梦麟、王世杰、胡适、蒋廷黻等，以及著名实业家刘鸿生、顾振、张嘉璈、徐新六、吴鼎昌、吴蕴初、范旭东等。^①该会还聘任了更多的技术专家为专门委员，从事与国防有关的具体研究工作，如王守竞、高宗熙、叶企孙、吴有训等。^②

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之初，翁文灏提出该会四大工作目标：一、外交及国际调查，二、国防科学的研究；三、拟订国防经济建设计划；四、策划临时应变措施，并特别要求在一二年内制订一个全面经济建设计划。至 1934 年改组为资源委员会之前，国防设计委员会 7 个小组从事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内容，并且都形成了比较详细的报告，提供给政府相关部门参考。

经济与财政组工作主要有：由陶孟和主持，进行财政制度与状况的调查，与中央研究院研究改进田赋和税收问题，从海关等部门调查中国国际贸易情况；研究粮食供求平衡办法，各种必需物资的代替、补充、购买，以及对国防必需品限制外流、奖励进口的方法等；派人赴欧洲考察各国货币制度，参与研究中国币制改革。

原料与制造组，一是在翁文灏、丁文江具体主持下由地质调查所进行中国矿产资源及其战时如何开发利用的调查和设计；二是在著名经济学家刘大钧主持下，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对全国 145 个重要工业县市雇工 30 人以上、使用动力的 2435 个工厂进行调查统计，编制了《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矿产资源调查的重点是关涉国家战略资源的金属矿、煤矿、石油矿。如四川、青海的金矿，长江流域各省及山东、福建的铁矿，湖北、河南、山西、四川、云南铜矿，湖南、广西之铅锌矿，湖南、江西钨锡锰，云南锡及钨锡，浙江矾土等。煤矿的调查一是沿铁路、长江已开发的矿，详细调查生产运销，以为战时燃料

① 翁文灏致钱昌照函（1933 年 2 月 19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廿八全宗，第 18733 卷。

② 翁文灏致钱昌照函（1933 年 2 月 19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廿八全宗，第 18733 卷。

统制准备，二是内地发展重工业需要新开或扩充的矿，如江西萍乡、高坑、天河及湖南潭家山。液体燃料、石油方面，有陕北、四川的调查及钻探，国内石油供需情形调查，以及地质调查所的烟煤低温蒸馏试验。此外，有水力调查：黄河壶口水力、甘肃黄河水力，长江上游水力，浙东、四川水力；西北矿产调查。形成了《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四川水力发电计划》等报告和计划。

运输与交通组分铁路、公路、航空、电讯四个部分进行调查，并拟定了战时运输和电讯计划，编订了《全国铁路军事运输能力报告》《运输动员及统制初步计划》等多项调查报告和战时计划。

土地与粮食组对长江6省农政、地政进行了调查，还有人口抽样调查、全国总人口的测算、户籍行政调查、军人体格研究等。有《粮食存储及统制计划》等报告。

此外，该会还进行了西北地区和专门人才两个专题调查。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组为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仍由蒋介石亲兼，实际负责的正副秘书长也还由翁文灏、钱昌照继续担任。其工作中心也由国防调查与设计，转向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事业。由此至七七抗战全面爆发的近两年半内，资源委员会以工矿业建设为核心，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这时期内资源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有：

制订重工业建设计划。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之初，翁文灏即对未来开展实际国防经济建设工作有所布置，主张调查研究工作要从未来发生对外战争的实际出发。他提出，经济建设最重要的在于“有一个整个计划，平衡进行，彼此皆有产销、供求及运输等连带关系”，要求国防设计委员会要汇集政府各机关已往所作的“各种建设计划（尤其是实业、铁道、交通各部的）及其计划的技术的根据……详加研究”，争取在一两年内制定一个全面的经济建设计划。他特别强调：要调查一旦有“国际军事”，中国所需军工原料，例如，硝矿、钢铁等，“究竟现在需要若干，用何方法供给？照现在所计划的，应需若干，品质如何？”并设法调查中国企业生产能力；还要搜集学术研究机构已做的，与建设计划有关的各种调查研究材料，例如各种矿产报告等，使国防设计委员